

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基于 2019 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的分析

刘 伟 彭 琪

内容提要:基层人大选举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大议题。参与基层人大选举是公民基于整体生活质量、政府工作表现认知的行为选择。考察民众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关系的 6579 份全国性调查问卷显示:民众政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对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民众生活满意度在政府满意度和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尽管政府满意度高的公民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概率更高,但这一差异不完全由政府满意度造成,还受到生活满意度中介效应的影响。为此,要从认知重构、注意力引导以及互动情境营造入手,促进公民的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转化为其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

关键词: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政府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认知行为理论 倒置溢出理论

一、引言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①基层人大选举是彰显民心、表达民意的一种制度化形式,在基层人大选举中,公民直接表达政治意见,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汇聚多数人的想法并达成一定政治承诺,从而得到广泛关注。从主流话语来看,无论是十九大报告指出“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②,还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③,均反映出以基层人大选举为主要形式的公民政治参与被提升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位置。从经验现实来看,基层人大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公民深度参与。相较于“政治嵌入”,重视公民力量的“社会嵌入”更能体现人大机关的代表性和回应性,推动人大

* 本文为武汉大学“双一流”建设引导专项子项目“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413100034)的研究成果。感谢《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文中的疏漏错误由笔者负责。

①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9 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4 日。

机关的进一步发展^①。因此,如何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更好地发挥公民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有关研究在对近年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趋势进行总结时发现,虽然基层选举仍是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首选方式,但投票参与在所有政治参与活动中的比例已由2002年的54.6%下降至2015年的46.9%,公众政治参与正处于由传统型政治参与向效用型政治参与的转型时期^②。这意味着,当前公民参与基层人大选举并不必然是政治动员的被动结果,而是公民表达“对现行权威结构的支持”“维护或获取自身利益”^③的自觉选择。也就是说,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将会越发紧密地与个体的内心感受、分析判断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如果没有重新审视公民的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我们将难以理解公民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基层人大选举背后的心理动因,也将难以实现“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④目标。

目前有关民众主观因素与基层选举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村委会/居委会选举以及村/单位选举层面^⑤,即使部分研究将焦点转向基层人大选举,也仅限于关注城镇居民等特定群体^⑥或者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公民选举参与情况^⑦,而不是整体性讨论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如果能够从政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出发,对基层人大选举参与的主观影响因素开展整体性研究,厘清民众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认知机制,不仅有助于扩充现有研究内容,还可以为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

二、文献综述

(一) 制度化政治参与

一般认为,政治参与不仅具有多元形态,涉及“政治系统的所有层次”,还对“个体道德、公民健康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具有积极意义^⑧。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不同,制度化政治参与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行动在制度过程中展开。有学者从信息传递视角出发,将制度化政治参与划分为两种模式:其一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沟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公民处于被动接受位置,政治参与水平较低,如以传递科学知识为主要目标的新闻发布会;其二是双向对话与信息交换,这种模式中的公民扮演着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政策制定成为公民与政府互动的结果^⑨。显然,具有民主价值取向的基层人大选举属于后者。伴随着中国人大选举制度改革由“协商酝酿”转变为“适度竞

① 庄文嘉、岳经纶:《政治嵌入,还是嵌入社会——2006—2009年地方人大经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

② 易申波、肖唐镖:《衰落抑或转型:近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动向——基于3波ABS调查数据的分析》,《探索》,2017年第3期。

③ 刘欣、朱妍:《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⑤ John James Kennedy, Hongyan Liu and Haruka Nagao, “Voting and Values: Grassroots Elections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 6, No. 2, 2018; 王丽萍、方然:《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基于一项调查的考察与分析》,《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⑥ Jie Chen and Yang Zhong, “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4, No. 1, 2002.

⑦ 郑建君:《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与政治知识的边界效应——基于政治效能感与参与行为的机制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⑧ Frank Bealey,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9, p. 254.

⑨ Gene Rowe and Lynn J. Frewer, “Public Participation Methods: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Vol. 25, No. 1, 2000.

争”,人大监督功能由“形式化监督”转变为“实质性监督”^①,公民已经获得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政治机会结构,这成为扩大制度化政治参与、削弱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有利条件。但是,中国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现实界限并不清晰,甚至存在“行政吸纳”的“中间地带”^②。这种模糊状态使得部分群体的意志与利益未能得到有效表达,其政治参与行为也未能完全进入制度化轨道,存在一定的社会治理风险。只有妥善处理好政治参与和制度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将政治参与和制度化水平的比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真正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③。本文聚焦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这种制度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政治参与活动,并将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行为视为在既定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政治行动,强调公民依托投票这类制度化渠道进行认知传递和意愿表达。

(二) 人大选举参与

在新时代,中国人大选举制度建设工作进入新阶段:一是在关系确认方面,“人大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被列入人大工作重点关注的“五个关系”;二是在机构定位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中的桥梁角色逐渐凸显^④;三是在人大代表定位方面,人大选举制度对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和工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四是在制度环境方面,通过开辟人大代表联络站、立法听证会等多种渠道,为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加强与人大代表的日常联系提供制度便利。但是,在人大选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同时,选举参与冷漠、选举参与行动转化率不高^⑤等问题依然存在。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在相关制度条件已经较为完善的前提下,公民参选率不高的原因部分源于公民自身。有学者指出,由于基层人大选举与公民的直接关联程度不高,公民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利益动机不足^⑥,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更多是“行政动员”^⑦等外在动机驱动下的结果。这的确反映了公民政治参与实践的部分事实,但也忽略了中国公民向“政治人”转化过程中的自我评判倾向。公民的参与动机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而是受到公民主观认知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在分析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时,有必要从微观层面出发,将认知因素纳入分析范围内,分析公民对日常生活、政府绩效的认知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基层人大选举中的投票行为。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 认知行为理论与倒置溢出理论

认知行为理论是人们对行为理论和认知理论在概念、方法、技术等方面进行整合的结果。该理论最早应用于心理疾病、消极行为治疗,随后扩展到积极行为引导、建构等领域。有学者曾划分了认知行为理论的发展历程:将情绪与行为直接关联、推动经验转向的第一波,由行为转向认

① 陈文、陈科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 70 年的进路与逻辑》,《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6 期。

② 郎友兴、谢安民:《行政吸纳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以浙江省乐清市 L 镇“以外调外”实践为例》,《理论与改革》,2017 年第 4 期。

③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73 页,三联书店,1989 年版。

④ 郝铁川、竺常赞:《试论习近平同志关于人大理论和工作的新阐述》,《学习与探索》,2019 年第 8 期。

⑤ 徐理响:《论基层群众选举认知与行动间的悖论》,《学术界》,2019 年第 11 期。

⑥ 郑建君:《个体与区域变量对公民选举参与的影响——基于 8506 份中国公民有效数据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⑦ 郑建君:《政治效能感、参与意愿对中国公民选举参与的影响机制——政治信任的调节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知作用的第二波,以及关注心理现象的语境和功能变化的第三波^①。虽然认知行为理论内部仍存在较大分歧,但它们具有如下共同点:第一,对认知和行为进行根本性区分,指出认知活动能够对人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人类行为会随着认知活动的改变而改变^②;第二,研究者通常围绕情感、认知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并开发了诸如 KAP 模型、社会认知理论等分析框架。但是,认知行为理论一方面未能对认知作用于行为的过程作明确回答,另一方面也未能对认知的内涵和层次进行明确界定,使得认知与其他变量间关系呈现出模糊状态。例如,有学者将情感与认知统一于态度之中^③,而有的学者则指出情感涉及基础性的认知过程^④。对认知定义和作用过程的模糊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认知行为理论的解释力。

如果说认知行为理论统合了研究对象的内在认知与外在行为进行,倒置溢出理论则揭示了特定认知变量的层次结构,对位于不同层面或领域的认知间关系进行了探讨,从而部分弥补了认知行为理论的不足。具体而言,倒置溢出理论主要关注满意度这一认知变量,将满意度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划分为:与具体生活事件密切相关的满意度,与家庭、休闲、工作等特定生活领域密切相关的满意度以及整体生活满意度^⑤。倒置溢出理论认为,低层级满意度对高层级满意度具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垂直溢出效应。这种认知影响已经得到部分研究的证实。例如,有研究者对主要欧盟国家的调查表明,民众住房满意度和邻里满意度对整体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预测作用^⑥。有学者则发现,良好的旅游体验不仅对民众休闲生活领域的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还进一步影响民众整体生活满意度^⑦。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的认知机制,本文选择认知行为理论和倒置溢出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本文将认知界定为个体基于特定情境对自我关系和自我与他者间关系的思维过程,这在相当程度上设定并限制了个体的行为选择空间^⑧。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正是来自于公民个体对这两种关系的判断。政府满意度是公民个体对公民与政府间关系这一特定领域的判断,而生活满意度则是公民个体对自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估。一言以蔽之,认知行为理论在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这两个认知变量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之间搭建了理论桥梁,而倒置溢出理论则对政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认知层面和作用方向作出了明确定位。

(二) 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1. 政府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本文对政府满意度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政府职能范围

① Steven C. Hayes,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Relational Frame Theory, and the Third Wave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Therapies”, *Behavior Therapy*, Vol. 35, No. 4, 2004.

② Stephen D. A. Hupp, David Reitman and Jeremy D. Jewell, “Cognitive-Behavioral Theory”, In Michel Hersen and Alan M. Gross (eds.), *Handbook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2: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p. 263.

③ 参见 Richard Cooke and Paschal Sheeran, “Moderation of Cognition-Intention and Cognition-Behaviour Relations: a Meta-Analysis of Properties of Variables from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43, No. 2, 2004.

④ Nico H. Frijda, “The Place of Appraisal in Emotion”, *Cognition & Emotion*, Vol. 7, No. 3 - 4, 1993.

⑤ M. Joseph Sirgy et al., “Developing a Measure of Community Well-Being Based on Perceptions of Impact in Various Life Domai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96, No. 2, 2010.

⑥ Earl E. Davis and Margret Fine-Davis, “Social Indicators of Living Conditions in Ireland with European Compariso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25, No. 2 - 4, 1991.

⑦ M. Joseph Sirgy et al., “How Does a Travel Trip Affect Tourists’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Vol. 50, No. 3, 2011.

⑧ Kristen R. Monroe and Connie Epperson, “‘But What Else Could I Do?’ Choice, Identity and a Cognitive-Perceptual Theory of Ethical Political Behavior”,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5, No. 2, 1994.

满意”^①上,认为公民定期评价政府各项工作表现,有利于政府及时回应公民现实需求,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现有研究已经意识到公民对政府表现的满意度与其政治行为之间的可能关联,这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公民的政府满意度对其参与不同类型政治活动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公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对其参与温和型、激烈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②;第二,公民对政府绩效的良好评价会促进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维权行为,反之则易出现过激维权行为^③。对政府表现感到满意的公民会更倾向于参与选举活动以表示对政府的支持^④。由此推断,公民对政府表现的满意度可能会对其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具有正向作用。

2. 生活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作为主观幸福感的认知部分,生活满意度是人们根据一定标准对其整体生活质量的主观判断^⑤,反映了个体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⑥。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不仅能提高公民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性,塑造公民的成熟人格^⑦,还能降低公民选择持有股票等风险性资产^⑧的可能性。具体到政治学研究领域,有关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⑨,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公民越倾向于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⑩。根据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各类需求具有一定优先次序。当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以满足,便会进一步寻求诸如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⑪。当生活满意度提高时,公民参与基层人大选举活动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高。

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政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属于认知因素,但两者所涉及的范围与层次并不相同。政府满意度是公民对政府工作表现这一生活子领域的特定认知,而生活满意度是公民对周遭生活的总体认知。有学者指出,公民的主观认知需要一定的转变过程才能转换为政治参与行为^⑫,而已有研究表明政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⑬。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公民对政府绩效的良好认知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作用。进一步讲,公

① 王浦劬、孙响:《公众的政府满意向政府信任的转化分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3期。

② 李保臣、李德江:《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探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③ 卢海阳、郑逸芳、黄清祥:《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基于中国16个城市的实证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8期。

④ Stockemer Daniel, “What Drives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Two Level Study”,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51, No. 2, 2014.

⑤ Diener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Vol. 49, No. 1, 1985.

⑥ 佩德罗·孔塞桑、罗米娜·班德罗:《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7期。

⑦ Jule Specht, Boris Egloff and Stefan Schmukle, “Examining Mechanisms of Personality Maturation: the Impact of Life Satisfa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Vol. 4, No. 2, 2013.

⑧ 张海洋、耿广杰:《生活满意度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⑨ 宋丽娜、西蒙·阿普尔顿:《中国城市地区的生活满意度:构成要素与决定因素》,《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6期。

⑩ Lorenzini Jasmin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Comparison of Unemployed and Employed Youth”,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6, No. 2, 2015.

⑪ 参见 Mahmoud A. Wahba and Lawrence G. Bridwell, “Maslow Reconsidered: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Need Hierarchy Theor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Vol. 15, No. 2, 1976.

⑫ Eran Vigoda-Gadot,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Politics and Ethic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Five-Year National Study of Their Relationship to Satisfaction with Services, Trust in Governance, and Voice Orient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17, No. 2, 2007.

⑬ 郑昱:《生活满意度与政府满意度的关系变迁——基于2005年—2010年某省城乡居民社会态度的调查数据》,《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民的政府满意度可能会通过生活满意度对其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针对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以及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之间的关系,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公民的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可能性越高。

H2:生活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公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其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可能性越高。

H3:政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公民的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

H4:生活满意度在政府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四、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2019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项目组的调研。该调查数据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根据中国行政区划,抽样分为两层:第一层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包括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第二层为二级行政区划单位,包括31个一级行政单位下的各个地区、盟、自治州、(地级)市。本次调查将调查对象限定为全国18周岁以上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中国民众的政治心态和政治行为。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深度调查,本次调查委托专业调查公司进行数据录入,通过电话访谈共获得7015份样本。在问卷设计阶段,笔者进行了小规模试调查,向专家咨询问卷修改意见,剔除不合理选项后形成最终调查问卷。整个调查过程受到严格监控,确保数据质量。经过后期处理,本文剔除了逻辑混乱、信息缺失的样本,获得有效样本6579份。本文数据具有一定优势:第一,时效性强。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民众的政治心态和政治行为数据,反映当前中国民众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倾向;第二,覆盖面广。本次调查作为一项全国性调查,研究对象包括全国范围内18周岁以上的公民,结论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

(二)变量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取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政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要变量,各变量的具体赋值如表1所示。

1.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通过“您是否在最近一次当地人大代表选举中投票”^①进行测量。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

2. 政府满意度。通过询问“您如何评价下列领域中(促进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打击官员腐败、维护社会秩序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政府表现”进行测量。回答“非常不满意”赋值为1,回答“不太满意”赋值为2,回答“一般满意”赋值为3,回答“比较满意”赋值为4,回答“非常满意”赋值为5,并取样本对上述5个方面的回答的算术平均值为政府绩效评价的最终测量结果,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0.817。

3. 生活满意度。通过询问“从1到10,您的生活整体满意度是多少?1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进行测量。

4. 代表候选人推荐。通过询问在过去的三年之中,您“在人大选举中推荐候选人”的参与情

^① 本文所指的“人大选举”是县(区)乡(镇)两级的人大代表选举活动,这也是绝大多数公民最常参与的人大选举活动。

况如何？1 表示从不参与,2 表示偶尔参与,3 表示一般参与,4 表示经常参与,5 表示总是参与。

5. 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参考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性别、年龄、户口类型、现居地类型、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职业设为控制变量。

表 1 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政府满意度	取各题项的算术平均值
生活满意度	1—10
性别	男 = 1,女 = 0
年龄	18 岁—34 岁 = 1,35 岁—54 岁 = 2,55 岁及以上 = 3
文化程度	文盲 = 1,小学 = 2,初中 = 3,高中 = 4,中职 = 5,大学专科 = 6,大学本科 = 7,研究生及以上 = 8
户口	农业户口 = 1,非农业户口 = 0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1,非中共党员 = 0
职业	国家机关人员 = 1,其他职业 = 0
现居地	乡镇 = 1,县或县级市 = 2,中等城市(地级市) = 3,大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特区城市等) = 4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参与 = 1,没参与 = 0
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	从不 = 1,偶尔 = 2,一般 = 3,经常 = 4,总是 = 5

(三) 样本特征

总体而言,本文的样本具有如下特征:从性别分布来看,样本共包含 4316 名男性和 2263 名女性,近一年内参与过基层人大选举的公民主要为男性,占比 70.6%;从年龄分布来看,年龄段人数最多的是 18—34 岁,占比为 46.5%,近一年内参与过基层人大选举的公民主要集中于 35—54 岁,这部分群体占参与投票群体的 51.9%;从户口类型来看,两类居民分布较为均衡,农业户口居民为 3319 人,非农业户口居民为 3260 人。在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群体中,非农业户口居民参与程度略高于农业户口居民,占比为 55.1%;从现居地类型来看,调研对象主要居住于乡镇,占比为 33.7%,在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群体中,居住于乡镇的居民参与率最高,占比为 35.6%;从文化程度来看,占比最高的是大专学历,为 25.1%,而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群体多数都拥有本科学历,占比为 25.1%;从政治面貌来看,参与本次调研的公民主要为非中共党员群体,占比为 81.2%,在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群体中占比为 65.4%;从职业分布来看,非国家机关人员占大多数,占比为 96.1%,同时他们也是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主要群体,占比为 92.3%。

五、实证分析

(一) 相关性分析

本文在变量赋值的基础上对各变量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民众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与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政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了前文提出的有关研究假设。此外,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与性别、年龄、户口、现居地、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职业均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因此,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可作为后续分析的控制变量。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1									
2. 政府满意度	0.149 ***	1								
3. 生活满意度	0.123 ***	0.372 ***	1							
4. 性别	0.054 ***	-0.014	-0.077 ***	1						
5. 年龄	0.184 ***	0.015	0.077 ***	0.063 ***	1					
6. 户口	-0.056 ***	0.018	-0.070 ***	0.087 ***	-0.136 ***	1				
7. 现居地	-0.044 ***	-0.056 ***	0.001	-0.088 ***	-0.095 ***	-0.356 ***	1			
8. 文化程度	0.021 *	0.002	0.064 ***	-0.103 ***	-0.305 ***	-0.379 ***	0.393 ***	1		
9. 政治面貌	0.205 ***	0.112 ***	0.123 ***	0.086 ***	0.168 ***	-0.165 ***	0.015	0.186 ***	1	
10. 职业	0.100 ***	0.075 ***	0.087 ***	0.020	0.045 ***	-0.131 ***	0.010	0.135 ***	0.253 ***	1
M	0.21	3.77	7.47	0.67	1.66	0.50	2.21	5.11	0.19	0.039
SD	0.40	0.77	2.15	0.48	0.69	0.50	1.04	1.65	0.39	0.19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二) Logit 回归分析

由于被解释变量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是离散变量且公民只有两种选择, $y = 1$ (参与投票) 或 $y = 0$ (没有参与投票), 因此本文选择 Logit 模型对调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3 所示)。

在模型 1 中, 加入控制变量后, 除了文化程度和户口类型, 其他变量均对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男性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是女性的 1.18 倍; 相对于 18—34 岁的公民, 35—54 岁的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高 2.39 倍, 55 岁及以上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高 3.06 倍; 与居住于乡镇的公民相比, 居住于县或县级市的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高 0.81 倍, 居住于中等城市的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高 0.68 倍, 居住于大城市的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高 0.71 倍; 党员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是非党员的 2.24 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1.57 倍。在模型 2 中, 加入政府满意度后,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政府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 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增加 60.3%。模型 3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生活满意度,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生活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 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增加 13%。模型 4 则是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满意度, 可以看到,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政府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 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增加 49.9%, 而生活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 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概率增加 7%。Logit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政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对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 因此, H1 和 H2 得到验证。

表 3 Logit 回归分析

	(1)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2)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3)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4)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性别(女)	1.180 * (0.0824)	1.210 ** (0.0853)	1.232 ** (0.0866)	1.235 ** (0.0874)

续表

	(1)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2)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3)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4) 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年龄(18岁—34岁)				
35岁—54岁	2.394 *** (0.181)	2.468 *** (0.189)	2.369 *** (0.180)	2.442 *** (0.187)
55岁及以上	3.056 *** (0.324)	3.127 *** (0.336)	2.860 *** (0.306)	3.002 *** (0.324)
户口(非农业户口)	0.986 (0.0771)	0.964 (0.0761)	0.992 (0.0778)	0.971 (0.0768)
现居地(乡镇)				
县或县级市	0.809 * (0.0713)	0.825 * (0.0736)	0.812 * (0.0719)	0.826 * (0.0738)
中等城市	0.684 *** (0.0650)	0.706 *** (0.0677)	0.694 *** (0.0662)	0.709 *** (0.0680)
大城市	0.708 ** (0.0816)	0.772 * (0.0897)	0.722 (0.0848)	0.780 * (0.0907)
文化程度(文盲)				
小学	0.939 (0.512)	0.822 (0.462)	0.975 (0.538)	0.851 (0.479)
初中	1.114 (0.587)	1.078 (0.586)	1.161 (0.619)	1.102 (0.601)
高中	1.042 (0.551)	1.048 (0.555)	1.081 (0.578)	1.036 (0.566)
中职	1.113 (0.597)	1.074 (0.593)	1.137 (0.616)	1.085 (0.600)
大学专科	1.355 (0.718)	1.324 (0.723)	1.373 (0.735)	1.331 (0.728)
大学本科	1.528 (0.812)	1.462 (0.801)	1.537 (0.826)	1.467 (0.806)
研究生及以上	2.624 (1.473)	2.718 (1.571)	2.780 (1.576)	2.778 (1.608)
政治面貌(非中共党员)	2.244 *** (0.174)	2.069 *** (0.162)	2.128 *** (0.166)	2.032 *** (0.160)
职业(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1.571 ** (0.226)	1.442 * (0.209)	1.476 ** (0.213)	1.408 * (0.205)
政府满意度		1.603 *** (0.0711)		1.499 *** (0.0710)
生活满意度			1.130 *** (0.0184)	1.070 *** (0.0185)
常量	0.103 *** (0.055)	0.100 *** (0.055)	0.097 *** (0.052)	0.098 *** (0.054)
样本量	6579	6579	6579	6579
伪R ²	0.072	0.090	0.081	0.092

注：* p<0.1，**p<0.05，***p<0.01。

(三) 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被解释变量选举参与是二分类变量,中介变量生活满意度为连续变量,因此,本文选取广义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为保证路径分析清晰明确,图 1 主要选取重点关注的部分变量进行呈现。如图 1 所示,从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基层人大选举参与的影响路径来看,生活满意度在政府满意度对基层人大选举参与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政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政府满意度不仅对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具有直接影响,还会通过生活满意度促进基层人大选举参与,H3 和 H4 得到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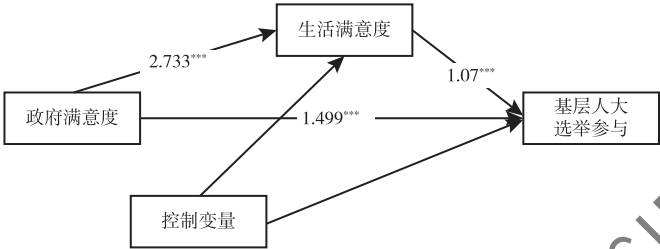


图 1 中介效应分析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四) 稳健性检验

与仅基于基准模型的推断相比,稳健性检验通过提供来自合理替代模型的额外证据,潜在地提高了推断的有效性,实现了简洁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最佳平衡^①。鉴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与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正相关,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投票的公民参与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②,本文选取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作为基层人大选举参与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 $P < 0.05$,拒绝原假设,相关模型的平行性检验未能通过,因此本文选择使用多项逻辑回归进行分析。如表 4 所示,以“从不参与”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作为参照组,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模型 5 的政府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偶尔参与”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的概率增加 27.5%;模型 6 的政府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一般参与”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的概率增加 35.5%;在模型 7 中,政府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经常参与”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的概率增加 110.6%,而生活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经常参与”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的概率增加 12.8%;在模型 8 中,政府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总是参与”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的概率增加 130.4%,生活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总是参与”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的概率增加 15.1%。

在中介效应分析中,如图 2 所示,政府满意度不仅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还通过生活满意度,对公民“偶尔参与”“一般参与”“经常参与”“总是参与”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均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尽管生活满意度在多项逻辑回归中对公民“偶尔参与”“一般参与”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偶尔参与”“有时参与”比较接近于“从不参与”,整体而言,以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为被解释变量而做出的结论较为稳健可靠。

① Eric Neumayer and Thomas Plümper, *Robustness Tests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 – 18.

② 相关研究通常将两项内容纳入直接选举参与进行考虑,例如郑建君:《政治知识、社会公平感与选举参与的关系——基于媒体使用的高阶调节效应分析》,《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

表 4 多项逻辑回归分析

	(5) 偶尔参与	(6) 一般参与	(7) 经常参与	(8) 总是参与
性别(女)	0.992 (0.0673)	1.201* (0.107)	1.530** (0.213)	1.619** (0.277)
年龄(18岁—34岁)				
35岁—54岁	1.546*** (0.113)	1.646*** (0.156)	3.419*** (0.529)	3.961*** (0.739)
55岁及以上	1.874*** (0.214)	2.692*** (0.359)	5.459*** (1.076)	5.030*** (1.260)
户口(非农业户口)	1.015 (0.0776)	0.913 (0.0898)	1.044 (0.156)	1.170 (0.214)
现居地(乡镇)				
县或县级市	0.893 (0.0800)	0.877 (0.100)	0.663** (0.103)	0.905 (0.177)
中等城市	0.803* (0.0753)	0.893 (0.105)	0.315** (0.0613)	0.479** (0.111)
大城市	0.827 (0.0936)	0.828 (0.122)	0.407*** (0.0982)	0.782 (0.205)
文化程度(文盲)				
小学	1.749 (1.150)	3.229 (3.417)	1.096 (0.967)	246725.6 (117576295.5)
初中	1.653 (1.060)	4.652 (4.848)	1.311 (1.117)	278688.0 (132807838.1)
高中	2.563 (1.644)	4.366 (4.558)	2.034 (1.736)	392928.4 (187248724.6)
中职	2.436 (1.575)	4.169 (4.375)	1.463 (1.278)	319171.4 (152100091.9)
大学专科	2.376 (1.626)	3.913 (4.089)	1.580 (1.359)	489211.1 (233131956.4)
大学本科	2.700 (1.739)	4.387 (4.591)	1.98 (1.713)	647422.9 (308527289.0)
研究生及以上	3.095 (2.094)	4.810 (5.214)	3.739 (3.488)	1210762.1 (576984895.6)
政治面貌(非中共党员)	1.544*** (0.136)	1.393** (0.156)	3.250*** (0.441)	4.130*** (0.662)
职业(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1.108 (0.199)	1.426 (0.300)	1.970** (0.443)	1.448 (0.379)
政府满意度	1.275*** (0.0584)	1.355*** (0.0793)	2.106*** (0.194)	2.304*** (0.266)
生活满意度	1.017 (0.0166)	1.038 (0.0217)	1.128*** (0.0380)	1.151** (0.0501)
常量	0.121*** (0.078)	0.030*** (0.031)	0.015*** (0.013)	2.24e-08 (0.000)
样本量	6579			
伪 R ²	0.065			

注：* p < 0.1，**p < 0.05，***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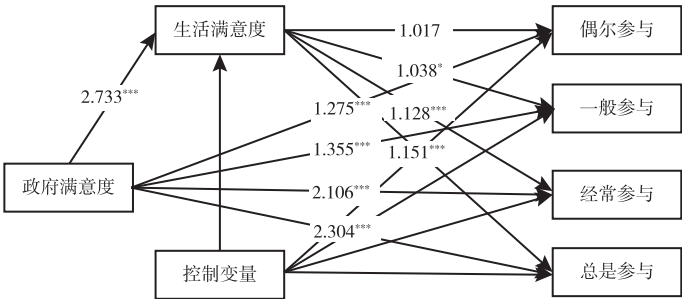


图 2 中介效应分析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 2019 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的 6579 份数据,本文在认知行为理论、倒置溢出理论的基础上,考察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和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本文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主要表现为:一是本文从个体心理层面证明了民众生活满意度在政府满意度和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构建了“专项认知—综合认知—行为”的作用路径,进一步揭示了基层人大选举参与的认知机制;二是本文发现的“高政府满意度、高生活满意度与高概率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在政策设计过程中对公民的认知因素进行重新审视,引导公民的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转化为积极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立足于经验观察和研究结论,本文拟从认知重构、注意力引导以及互动情境营造三个方面提出有效促进公民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的政策建议。

第一,认知重构。在信息爆炸背景下,公民倾向于付出“最低限度的认知努力”,做出自认为最合理的行为选择^①。这使得公民通常会以日常生活作为认知参照系,将生活满意度、政府满意度作为是否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重要依据。这种认知策略虽然部分弥补了公民在政治关注、政治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但也潜藏着行为偏差风险,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深入推进。为此,一方面,要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政治教育,培养公民责任意识,增强基层人大选举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联程度,引导公民进行正确归因,将参与基层人大选举活动转化为公民的自觉、自发行为;另一方面,社区要承担起组织公民的责任,举办多种贴近居民日常生活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加深公民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理解,让公民积累丰富的“政治认知储蓄”,以强化公民的适应性认知的方式促进其基层人大选举参与。

第二,注意力引导。如果说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政策问题和政策方案会纳入政策议程^②,那么,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的注意力推动公民认知结构的形成,进而引导着公民政治行为的建构。公民的有限注意力若能聚焦于基层人大选举,将会极大提升公民的参与积极性,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一是塑造民众

① Richard R. Lau and David P. Redlawsk,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gnitive Heuristics i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5, No. 4, 2001.
② 向玉琼:《注意力竞争的生成与反思:论政策议程中的注意力生产》,《行政论坛》,2021 年第 1 期。

长期记忆。在注重正式文件颁布、官方媒体宣传的同时,以社区娱乐、民俗活动等生活化方式增强公民的视觉体验和参与意识,将基层人大选举融入公民的日常记忆之中。二是培养民众参与习惯。基层人大代表是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需求的“代言人”,也是公民是否参与基层人大选举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基层人大代表在工作过程中要增强自身与公民之间关系的“黏性”,进而培养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习惯。

第三,互动情境营造。公民的认知根植于特定的互动情境,公民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是特定认知在互动情境中的具象化。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虽然政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对民众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政府满意度对基层人大选举参与的影响强于生活满意度。这意味着互动情境的营造不仅要发挥先进人物的朋辈效应、增强公民身份认同、设置具有公共价值的社会议题以改善公民间的日常互动,更要在公民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始终保持公民表达和监督渠道的畅通,及时回应公民对政府工作的关切,强化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正向反馈,最终促进基层人大选举参与的可持续性。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在数据类型方面,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难以解决由不可观察的个体差异或异质性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这有待后续调研过程中纳入政府动员、就业单位性质等变量;二是在受访者应答方面,本文采取了受访者匿名进行自我报告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结论能否完全反映个体真实情况受到质疑。为此,本文通过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提升了样本代表性。三是在题项设计方面,对民众生活满意度以及基层人大选举参与等变量的单题项测量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后续需要细化测量内容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作者:刘伟、彭琪,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武汉市, 430072)

(责任编辑:林立公)

政治学研究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